

重啟改革議程

中國經濟改革二十講

RELAUNCHING CHINESE REFORMS

吳敬璉 馬國川◎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吳敬璉

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實鋼經濟學教席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導師、國際經濟學會榮譽主席。

主要研究領域為理論經濟學、比較經濟制度分析、中國社會轉型的理論和政策。

他倡導並努力推進市場化、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是“市場取向改革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對中國改革的思想理論和實踐有著重要的貢獻。他也是經濟體制比較研究學科的開創者之一，引介傳播了眾多對中國改革有益的現代經濟理論和國際經驗。

著有《十年紛紜話股市》、《何處尋求大智慧》、《改革：我們正在過大關》、《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等。

馬國川

《財經》雜誌主筆。曾供職於中國改革雜誌社、經濟觀察報社。多年來關注中國改革進程，“對時代性的課題有敏銳的觸悟與捕捉”（金耀基評語）。已出版《大碰撞》、《風雨兼程》、《我與八十年代》、《沒有皇帝的中國》等書。《大碰撞》是第一部全景式反映改革第三次大爭論的作品，被評為“2006年十大好書”之一。

目 錄

前 言	9
第 一 講 中國再度面臨“ 向何處去 ” 的問題	17
第 二 講 蘇式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為甚麼需要改革？	39
第 三 講 1956 年，中國改革問題的提出	63
第 四 講 第一輪經濟管理體制改革	85
第 五 講 向國企放權讓利的“ 市場社會主義 ” 改革沒有奏效	105
第 六 講 農村承包開啟“ 增量改革 ” 新戰略	127
第 七 講 民營經濟異軍突起	153
第 八 講 開放為改革增添動力	173
第 九 講 雙軌制的作用和它帶來的問題	195
第 十 講 1993 年：經濟改革進入“ 整體推進 ” 的新階段	219

第十一講	構築市場經濟的產權制度基礎	241
第十二講	重建金融系統	261
第十三講	回歸公共財政	283
第十四講	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之路阻且長	305
第十五講	經濟波動與宏觀經濟政策	329
第十六講	市場化改革尚未完成	351
第十七講	“ 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改革也搞不通 ”	373
第十八講	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的困境	393
第十九講	中國會成為尋租社會嗎？	415
第二十講	重啟改革議程	439

前 言

1998 年在紀念中國改革開放 20 週年的時候，我曾經借用狄更斯在《雙城記》開篇的那段著名的話來描繪當時“兩頭冒尖”的經濟和社會景況：“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們的前途無量，同時又感到希望渺茫；我們一起奔向天堂，我們全都走向另一個方向。”

從那時到現在，十多年過去了，這種“兩頭冒尖”的狀況卻似乎愈演愈烈。

從一方面看，經過 30 多年的持續高速增長，中國實現了經濟發展的三級跳：從一個典型的低收入國家成長為低中等收入國家，再進一步進入高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2010 年，中國的經濟總量超過了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由於人口眾多，體量巨大，它在全球事務中的分量也變得舉足輕重，成為一顆冉冉上升的國際新星。

可是從另一方面看，圖景卻遠不是那樣美妙亮麗。

實際上，中國的改革還只是走在半途。它在 20 世紀末初步建立起來的經濟體制，仍然是一種“半統制、半市場”的混合體制，

政府和國有經濟雖然已經不再囊括一切，但還是牢牢掌握國民經濟的一切“制高點”，主宰著非國有經濟的命運。且不說現行體制離“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作用”的要求還有很大的距離，即使已經建立起來的市場，也呈現出一種缺乏規則和權力多方干預的“原始”狀態。

在這種體制下，中國在實現高速增長的同時，各種矛盾也逐漸積累。特別是最近幾年來，在多方面的改革出現停滯甚至倒退的情況下，不但資源短缺、環境破壞使經濟活動和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受到威脅，愈來愈靠貨幣超發和信用膨脹來維持 GDP 的增長，使資產泡沫形成和資產負債表槓桿化等舊疾牽延未癒，腐敗活動愈益猖獗，侵入社會機體的方方面面，貧富差別懸殊，各種矛盾趨於激化，社會面臨破裂潰散的危險。

對於這種兩極共生現象的存在，多數人都是承認的。但是，對於為甚麼發生這樣的現象以及出路何在，卻有著截然相反的看法。

一種先被叫做“北京共識”，後來以“中國模式論”聞名的觀點對這種現象的解讀是：中國能夠創造如此優異的成績，根本的原因在於中國具有一個以強勢政府和國有經濟對社會的強力管控為基本特徵的政治和經濟制度。這種體制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有力地貫徹國家意志，因而能夠創造北京奧運、高鐵建設和一些地區 GDP 連續兩位數的增長等“奇跡”。而且由於它能夠在全球金融危機的狂潮中繼續保持 GDP 的高速度增長，為世界市場提供了支持，應該當之無愧地成為世界各國的楷模。

至於中國社會出現的種種亂象，在這種觀點看來，卻是政府的掌控還不夠全面有力，“舉國體制”的執行還不夠堅決徹底，因而市場自發力量還能夠干擾國家意志的貫徹。由此得出的結論，自然就是應當進一步擴大政府的權力，進一步加強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的控制，進一步強化這種強政府、大國企、用海量投資拉動 GDP 高速度增長的發展模式。

我們的看法和上述觀點完全相反。

只要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前 30 年和後 30 年的情況做一番比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模式論”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獲得的良好成績所作的解讀，是完全無法令人信服的。如果說強勢政府和國有經濟的強力管控是中國經濟崛起的秘密，那麼，在改革開放前的 30 年中，中國擁有一個較之當下更強勢的政府和一統天下的國有經濟，為甚麼中國人得到的卻是無窮無盡的苦難，經歷了一次大饑荒就奪去了成千上萬人生命的人間慘劇？相反，取得了巨大進步的後 30 年和始終未能改變貧困落後面貌的前 30 年之間的最大區別，在於中國進行了改革。在原有的所謂“榨取性體制”(extractive institutions)之外，以開放市場為前提的所謂“包容性體制”(inclusive institutions)也開始出現。

30 多年來，雖然各個領域改革的推進程度並不相同，且原有的政府和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還在一些重要領域保持未動，但這一輪改革畢竟使一個也對世界市場開放的市場經濟制度局部地建立起來。

市場制度的建立解放了久被落後制度所束縛壓制的生產力，中國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這具體地表現為：第一，改革為民間創業開拓了活動空間，使中國民間長期被壓抑的企業家精神和創業積極性噴薄而出。到 20 世紀末，中國已經湧現了 3000 多萬戶民間企業，它們乃是中國出人意料的發展的最基礎的推動力量。第二，市場的開放和民間創業活動的活躍，使大量原來無法流動的勞動、土地等生產要素能夠從效率較低的經濟活動流向效率較高的經濟活動。生產要素大量向相對高效部門的轉移所導致的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高，支持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度增長。第三，對外開放政策的成功執行，使中國能夠利用發達國家儲蓄率過低、投資缺口過大造成的機會，擴大出口，用國際市場的需求彌補國內需求的不足，從需求方面支持了產出的高速度增長。第四，實行對外開放的另一個重要作用，是在人力資本投資還沒有發揮作用、自主創新活動還沒有開展起來的條件下，通過引進國外的先進裝備和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在應用層面上迅速縮小了中國與先進國家之間在過去幾百年間積累起來的巨大技術水平差距，使高速度增長得到技術進步的有力支撐。

從另一方面看，中國社會存在的種種問題，正是由於中國改革尚未取得完全的成功，20 世紀末期初步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體制還很不完善造成的。

這種不完善性主要表現為國家部門（state sector，包括國有經濟和國家黨政機構）仍然在資源配置中起著主導的作用。具

體說來，表現在以下方面：（1）雖然國有經濟在經濟活動總量中並不佔有優勢，但它仍然控制著國民經濟的命脈（commanding heights），國有企業在石油、電信、鐵道、金融等重要行業中繼續處於壟斷地位；（2）各級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資金等重要經濟資源的巨大權力；（3）現代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礎尚未建立，各級政府和政府官員擁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他們通過直接審批投資項目、設置市場准入的行政許可、管制價格等手段對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進行頻繁的干預。

制度缺陷造成了兩個嚴重的問題：第一，是中國迫切需要的經濟增長模式轉型（或稱經濟發展方式轉型）遲遲不能實現，因此資源短缺、環境破壞、勞動者生活水平提高緩慢等問題變得愈來愈嚴峻；第二，權力對於經濟活動的廣泛干預造成了普遍的尋租環境，使腐敗活動不可扼制地蔓延開來，深入到黨政組織的肌體之中。

這一切足以說明，改革開放才是中國經濟能夠保持 30 年高速度增長的真正原因所在。改革和一切社會演變相同，正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如果不能將市場化的改革繼續向前推進，不但舊體制下資源浪費、效率低下、勞動者生活水平提高緩慢等痼疾得不到消除，在經濟效率由於前面講到的生產結構變化和“適應性創新”而有所提高以後，隨著城市化進入後期和中國產業技術水平與外國產業技術水平之間落差的大幅度縮小，如果不能找到新的支持有效率增長的來源，原有的生產率提高的勢頭也無法保持。這樣，中國就會落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

特別嚴重的是，由於本世紀初期以來，改革出現了停滯甚至倒退的傾向，這就使中國現行的“半統制 半市場”混合體制的消極方面更加強化。

事實上，這種“半統制 半市場”的經濟體制一旦建立，就只能有兩種發展前途：或者是政府逐漸淡出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加強自己在市場失靈的領域進行諸如市場監管和提供公共產品等方面的職能，逐漸成長為在規則基礎上運轉的現代市場經濟，我把它稱為法治的市場經濟；或者不斷強化政府對市場的控制和干預，不斷擴大國有部門的壟斷力量和對經濟的“控制力”，演變為政府控制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而在中國的條件下，從尋租活動中取得巨大利益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利用手中的權力和輿論工具竭力把社會拉向極右的方向。如果沒有力量阻斷這種進程，國家資本主義十有八九就會演化為權貴資本主義，即官僚資本主義或所謂“封建的 買辦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值得警惕的是：根據中國的歷史經驗，這種權貴資本主義的極右發展，也可能引發打著激進革命旗幟的極左力量的興起。極左往往是對極右的懲罰。在當今的中國，如果不能採取果斷的經濟和政治改革措施來制止權貴對國庫和各階層人民的掠奪，紓緩社會矛盾，就有可能發生顧准所說的“進化受到壅塞時的潰決”；而某些梟雄式的人物正好可以利用這種情勢，用“打土豪 分田地”一類極端“革命”的口號，誤導深受權貴壓榨因而熱切希望獲得公平正

義的大眾，把他們引向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歧途，使建設現代中國的進程遭到中斷。

由以上的分析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正站在新的歷史十字路口上。為了避免社會危機的發生，必須當機立斷，痛下決心，重啟改革議程，真實地而非口頭上推進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實現從威權發展模式（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alism）到民主發展模式（democratic developmentalism）的轉型。在我們看來，這是中國唯一可能的出路。

“善未易明，理未易察”。面對錯綜複雜的形勢，需要一切關心中國命運和前途的人們共同切磋，探求對“中國向何處去”問題的解答。我們希望在本書中通過兩人之間的對話，展現我們對中國改革歷程的回顧和對經濟社會現實的觀察思考，陳述我們探求中國如何平穩實現現代轉型的道路所得到的答案。

第一講

中國再度面臨“向何處去”的問題

馬國川：30 年來的改革和開放，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促成了中國在全球經濟地位的上升，也對世界歷史進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然而，近年來，中國卻似乎走到了歷史發展的一個新十字路口：一方面，被改革開放釋放出來的活力使中國經濟蒸蒸日上；另一方面，權力腐敗幾乎蔓延到社會的各個角落，貧富懸殊的程度使世人震驚，而且這一切大有愈演愈烈之勢。

由這裡，就提出了一個“中國向何處去”的嚴肅問題。

吳敬璉：目前，中國這種光明與黑暗“兩頭冒尖”的圖景的確顯得十分突出。從光明面看，30 年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2010 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超過日本，躍居全球第二位；中國出口超過德國，躍居全球第一位。與此同時，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度提高，成億人口脫離極貧地位。

像我這樣經歷過苦難年代的人對比現在和當年的情況，簡直恍若隔世。現在的年輕人無法想像，當年為了取得最起碼的生活必需品，需要持有從糧票、布票、肉票、食用油票到婦女衛生紙票等幾十種票證的生活情景。人們也很難設想，短短的 30 年，這個國家的經濟就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

可是事情還有另一方面。中國經濟迅速發展所付出的代價也極其高昂，而且對於一個擁有 13 億人口的大國來說，GDP 總量增長並不足以說明問題。特別嚴重的是，近年來資源短缺，環境

破壞愈演愈烈；腐敗蔓延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貧富差別懸殊，威脅到社會穩定。

馬國川：現在我們需要回答的問題是：甚麼原因使這種“兩頭冒尖”的現象愈演愈烈？因為只有弄清楚發生問題的原因，我們才有可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有效辦法。

吳敬璉：在我看來，這種“兩頭冒尖”的表現是與 20 世紀 70 年代末期開始的改革的整個歷程，或者說從蘇聯式的社會體制向現代中國轉型的方式密切相關的。在這個歷史過程的不同階段裡，提出了性質有所不同的“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

馬國川：您的這番話，提出了解答我的問題的一種思路。我們不妨從啟動改革前夕的狀況開始我們的討論。

上世紀 70 年代末期，中國所面對的是一種“國將不國”的深重危機。在當時的情況下，絕大多數中國人對於“中國向何處去”問題的回答是高度一致的。

吳敬璉：是的。當時中國面對的經濟社會情況是：50 年代末期“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剛剛過去，經濟開始恢復，極左路線的領導又發動了十年動亂的“文化大革命”。如果說，1949 年以後的多次政治運動和“大躍進”使普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受難，那麼在“文化大革命”中，即使作為舊路線執行者和舊體制支柱的黨政高級幹部也飽受迫害之苦，連國家主席也未能倖

免。據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葉劍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講話中指出的，“文化大革命”的掌權者“利用篡奪來的權力，大搞法西斯專政，上整幹部，下整群眾，製造大量冤案、錯案、假案，把許多老同志打倒，把大批幹部和群眾打成‘走資派’、‘反革命’，進行殘酷迫害。包括受牽連的在內，受害的有上億人口，佔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

經歷了如此巨大的災難和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朝野上下比較容易地形成了一種共識，這就是盡快對極左的方針路線和原有的“經濟管理體制”作出改變。就像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先念在1978年夏天召開的國務院務虛會議上所作的總結中指出的，“當務之急，是既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後的生產力，也要多方面地改變生產關係，改變上層建築，改變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改變人們的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不過，當時對於要向哪裡改變，或者說這種改變要達到甚麼樣的目標，並沒有達成明確和一致的認識。

在這種情況下，從實踐方面看，中國領導人採取的是“走一步，看一步”的“摸著石頭過河”，“不管黑貓黃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方針。不管是甚麼樣的政策和制度，只要能夠有助於恢復經濟、穩定社會，都可以拿來應用。

在當時進行全面改革의思想和理論準備不足的情況下，中國黨政領導採取的策略是，在保持命令經濟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的條件下，作出了一些變通性的制度安排，為原來遭

到最嚴格禁止的民間創業活動開拓出一定的空間。

第一，在土地仍然歸集體所有的條件下，以“包產到戶”的形式恢復農民的家庭經營。第二，在保持公共財政與企業財務合一的前提下，實行“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使各級地方政府有了促進本地經濟發展的積極性。第三，實行“雙軌制”，在物資的計劃調撥和行政定價的“計劃軌”之外，開闢出物資買賣和協商定價的“市場軌”。第四，在國內市場的“大氣候”尚未形成的情況下，構建對外開放基地的“小氣候”來與國際市場對接。

民營經濟“輔助作用”的發揮，促成了國民經濟的穩定恢復和發展。

馬國川：在這個時期，理論界似乎也在進行摸索。

吳敬璉：在理論層面上，最早摸到的一塊“石頭”，是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 60—80 年代先後進行的“市場社會主義改革”。所謂“市場社會主義改革”並不是要建立真正的市場，而是要在保留國有制的統治地位和計劃機關統籌全國經濟的條件下引進某些市場機制。當時有不少經濟學家研究蘇聯 60 年代的利別爾曼（Ecsei Liberman）建議和柯西金改革、南斯拉夫的“自治社會主義”、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和匈牙利的“新經濟體制”。

在中國，也有一種和這種市場社會主義想法相類似的改革思路，這就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

馬國川：從黨政領導機關的歷史文獻看，1982 年的中共十二次代表大會還明確地把“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確定為中國改革的目標。

這樣，作為對“中國向何處去”問題的回答，中國在上世紀 80 年代初期形成了一種各界人士都能接受的改革戰略。這種戰略和蘇聯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戰略很不相同，不是把工作重點放在國有企業的改革上，而是放在民營經濟自上而下的發展上。您曾經把它稱作“增量改革戰略”。您能否具體地談一談這種改革戰略的優劣和後續影響？

吳敬璠：從一方面看，這是一種十分成功的改革戰略。由於採用這種改革戰略，使中國避開了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曾經陷入的“國有經濟改革陷阱”，在大體維持國有經濟原有規模的同時發展民營經濟，並依靠民營企業的強大競爭力保持了經濟的迅速增長。

但在另一方面，這種戰略並沒有改變各級政府和國有經濟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地位。而且，這種戰略的延續造成了命令經濟和市場經濟雙重體制並存的狀態，造成了權力尋租的巨大空間，使腐敗活動日益蔓延開來。在上世紀 80 年代中期，利用政府計劃分配調撥物資的權力牟利的“官倒”現象，成為社會議論的焦點。

在這種背景下，重新提出了是否應當改變改革戰略和設定更加明確的改革目標的新一輪“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

馬國川：1984 年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以“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取代“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作為改革目標模式，雖然沒有完全擺脫“有計劃”的影響，但無疑是在回答“中國向何處去”問題上的重大突破。與此相適應，改革的推進方式也開始從增量改革嘗試向整體推進轉變。

吳敬璉：在改革的目標模式和改革的推進戰略這兩方面，都有一個逐步明確的過程。

從改革的目標模式方面說，到了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東歐的市場社會主義改革已經風光不再，連原來進行得最順利的匈牙利也陷入困境。與此同時，改革的倡導者 W. 布魯斯（Włodzimierz Brus）等也紛紛否定了自己早先的想法。1989 年出版了布魯斯和另一位流亡英國的波蘭改革派經濟學家拉斯基（Kazimierz Laski）合寫的書《從馬克思到市場》，明確否定了市場社會主義的觀點，轉而尋求建立真正的市場。

這樣，中國經濟學家漸漸失去了對“市場社會主義”的熱情，轉而向市場經濟國家尋求可以借鑒的榜樣。隨著“市場社會主義”影響的消退，當時世界上很有影響的市場經濟模式浮現在正在設計自己的改革目標的中國人的面前：一種是東亞式的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另一種是歐美式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大致上說，在這兩種模式中，東亞模式往往為官員們所鍾愛。像鄧小平本人就十分欣賞“四小龍”，特別是新加坡的許多做法。而歐美模式則為具有現代經濟學知識的學者所嚮往。

雖然兩種模式在如何界定政府的職能上有很大的差別，但在當時命令經濟還佔有統治地位的條件下，這種差別並不顯得那麼突出。而且在當時的情況下，即使以自由市場經濟為改革目標的人們也承認，在市場還沒有發育起來的條件下，政府不能不承擔更大的協調責任。因此人們傾向於同意發展經濟學家格申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的說法，在落後經濟向發達經濟衝刺的過程中，為了發揮“後發優勢”，強有力的政府往往是利大於弊的。於是，支持改革的人們在改革中達成了某種共識，即改革的初步目標應是建立起某種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發揮較之工業化國家更大作用的市場經濟。這可能就是有的學者所稱的“80年代的改革共識”。

馬國川：即使達成了這樣的階段性共識，採用何種方式或何種戰略去達到這種體制目標，其實也經歷了更長、更曲折的過程。

吳敬璉：的確是這樣。市場制度的核心是它的自由價格制度。所謂“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就是指由自由競爭形成、能夠反映資源供求狀況（稀缺程度）的價格決定資源的流向。所以，不論要建立哪一種類型的市場經濟，建立自由競爭的市場體系都是問題的關鍵。然而這不但有許多技術問題需要解決，而且由於會損害尋租者的特殊既得利益而受到阻撓和抵抗。

所以，以建立競爭性市場體系為核心的整體改革經過多次試驗和挫折，直到 1993 年 11 月的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實行“整體改革和重點突破相結合”的方針，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經濟的改革戰略才從“增量改革”轉向“整體改革”。

馬國川：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以後的許多改革措施卓有成效，為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作出關鍵性貢獻。

吳敬璠：根據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制定的總體規劃和實施方案，在此後幾年中，中國的經濟改革取得了不小的進展。

第一，國民經濟的所有制結構明顯優化，從國有經濟一家獨大的結構，變為多種所有制企業共同發展。除少數行政壟斷的行業外，民營經濟成為主要的經濟成份。在就業方面，民營企業成為吸納就業的主體。2006 年民營企業就業人數達到全國城鎮就業人員總數的 72%。國有企業的改革也取得了重要的進展。主要表現在：絕大多數非金融類的國有二級企業已經改組為國家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在金融類企業中，21 世紀初實現了四家國有商業銀行的海外整體上市，為中國金融市場提供了必要的微觀基礎。這些公司在股權多元化的基礎上搭起了公司治理結構的基本框架。

第二，初步建立起競爭性的市場體系。其中，商品市場在

20 世紀末期已經建立，金融市場則在 21 世紀初加快了發展。市場自由價格機制作用的發揮，使稀缺資源的配置更加具有效率，支撐了經濟的高速增長。

第三，國內的市場化改革與對外開放相配合，使中國能夠抓住全球化帶來的機遇，把中國的市場疆域擴展到全球。到世紀之交，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加工工業生產基地。

馬國川：中國雖然在 20 世紀末建立起市場經濟的基本制度，但是，為甚麼權力尋租的空間仍然巨大，腐敗活動也難以遏制呢？

吳敬璉：我認為，問題的癥結在於，中國的改革還沒有獲得完全的成功。

我在前面講過，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多數人形成的改革目標共識，是建立一種類似於日本等東亞國家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但是，在日本等國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模式下，政府干預主要通過中央銀行對信貸活動的“窗口指導”和通產省（MITI）對產業發展的政策引導實現的，政府並不直接進行經營活動。中國的情況與它們不同，中國現行體制是從列寧的國家辛迪加（state syndicate，一些東歐經濟學家把它稱為 Party-State Inc.，即“黨—國大公司”）演變而來，擁有龐大的直接管理國民經濟的國家機器和強大的掌握國民經濟命脈的國有經濟。因此，雖然東亞新興市場經濟的發展歷史表明，政府主導的市場經

濟以及和它相適應的所謂“威權發展模式”的進一步改革，其阻力是很大的，但是這與中國舊有體制市場化、法治化和民主化所遇到的抵抗和反對完全不可比擬。

這樣，中國在 20 世紀末 21 世紀初建立起來的新市場經濟體制，是一種較之東亞新興市場經濟，政府和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和整個社會更加具有控制力的“半市場、半統制”經濟。它的主要特質，是包括政府機構和國有經濟在內的國家部門（state sector）仍然在資源配置中起著主導的作用。具體說來，表現在以下方面：（1）雖然國有經濟在國民生產總值中並不佔有優勢，但是它仍然控制著國民經濟命脈，國有企業在石油、電信、鐵路、金融等重要行業繼續處於壟斷地位；（2）各級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資金等重要經濟資源流向的巨大權力；（3）現代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礎尚未建立，各級政府的官員有著很大的自由裁量權，他們通過直接審批投資項目、設置市場准入的行政許可、管制價格等手段對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進行頻繁的直接干預。

這種“半市場、半統制”的經濟是一種過渡性的經濟形態，它既包含新的、自由市場經濟的因素，也包含舊的、命令經濟或稱統制經濟的因素，既可以通過限制行政權力，使政府逐步退出微觀經濟活動領域，專注於公共服務的提供，或把它建設成在法治基礎上的現代市場經濟，也可以通過強化政府配置資源的權力和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使國民經濟向國家資本主